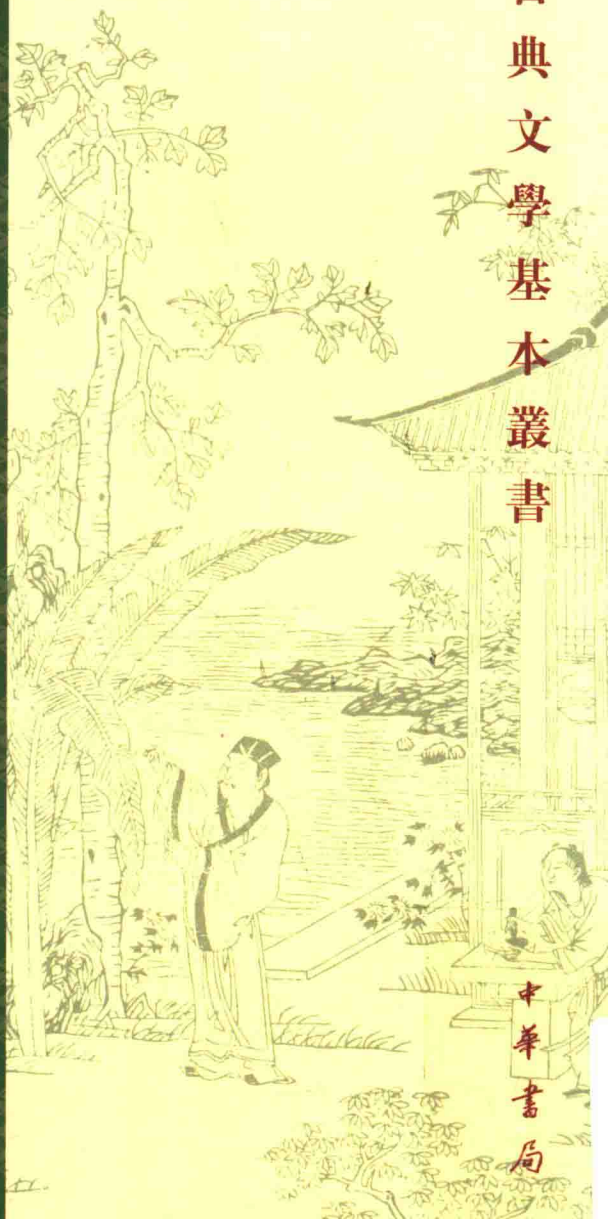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楊炯集箋注

第二冊



中華書局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楊炯集箋注

第一冊

祝尚書 箋注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楊炯集箋注/祝尚書撰. —北京:中華書局,2016.3
(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)
ISBN 978-7-101-11342-6

I. 楊… II. 祝… III. 唐詩-注釋 IV. I222.74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5)第 264370 號

責任編輯:馬 婧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楊 炯 集 箋 注

(全四冊)

祝尚書 撰

※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850×1168 毫米 1/32・50%印張・8 插頁・1268 千字

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-3000 冊 定價:168.00 元

ISBN 978-7-101-11342-6

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

前言

在人才輩出、群星璀璨的大唐帝國早期，出現了王勃、楊炯、盧照鄰、駱賓王四位作家，時稱「四才子」，文學史又稱「初唐四傑」。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文壇上，「四傑」也許算不上聲聲大家，但任何一部中國古代文學史，又都無法回避他們的成就和貢獻。四人都時運不濟，命運多舛，雖早得大名，一時光芒四射，卻又像流星般地劃過太空，很快消失了，留下來的多為散佚大半的詩文作品，供後人鑒賞、研究。本書箋注的，就是「四傑」之一楊炯的盈川集，爲了讓讀者不致陌生，我們將它更名爲楊炯集。

一、楊炯的身世、思想與政治立場

楊炯（六五〇—？），祖上蓋生活在北方朔漠，北周及隋唐時代占籍華州華陰縣（今陝西華陰市）。華陰在漢代隸屬弘農郡（治今河南靈寶市），而「弘農楊氏」是個赫赫有名的官宦世家。楊炯曾十分自豪地回顧列祖列宗的榮耀，寫道：「楊氏之先，其來尚矣。在皇爲皇軒，在帝爲帝譽，在王爲周武，在霸

爲晉文：此之謂不朽。西京爲丞相，東漢爲司徒，魏室爲九卿，晉朝爲八座：此之謂世祿。」（常州刺史伯父東平楊公墓誌銘）且不論所述歷史人物是否與楊炯家族有血緣關係，也不說皇王帝霸以上，僅就中古論，至少在楊炯心中，就有着令他激動不已的輝煌：西漢楊敞，昭帝時仕至丞相；其裔孫東漢楊震，家族中四世爲司徒、太尉，連高門孔融也不得不贊嘆：「楊公四世清德，海內所瞻。」（後漢書楊震傳）時至魏晉六朝，雖有九卿（曹魏時期的楊阜）、八座（晉代楊珧）可稱，但明顯地有些中衰。直到北周，楊初仕至大將軍，入隋封華山郡開國公、常州刺史，他便是楊炯的曾祖父。在隋唐鼎革之際的政治大動亂中，楊初子楊虔安欲領兵歸唐，被軍閥王世充所殺，於是唐開國後贈大將軍，以表忠烈。他的犧牲，使楊家在新王朝的政治版圖中得到了一席之地，從而世祿不墜。楊初的另一個兒子楊虔威，仕唐爲左衛將軍，封武安公，他便是楊炯的祖父。

自北周而下，楊家似乎多習武，爲將門，其家族大約屬於後魏逐漸形成的關隴軍事集團。但到楊虔威的孫輩，卻出了個弄文的「神童」、「才子」——楊炯。楊炯生於高宗繼位的第二年，即永徽元年（六五〇）。他生而聰敏，六歲便考中童子科，也就是俗所稱的「神童」。唐代童子科的錄取條件是：「十歲以下，能通一經及孝經、論語，卷誦文十，通者予官，通七，予出身。」（新唐書選舉志上）對於一個六歲的孩子，在當今尚不及入小學的年齡，他就已經能通經、誦文，檢徐松登科記考，這在唐代也罕見，可見楊炯的智商極高。十一歲時，楊炯待制弘文館。所謂「待制」，是說他已有了在弘文館做官的資格，但卻需要等待皇帝下令正式任命。成年後，楊炯娶開國大將軍李靖姪女亦即鎮軍大將軍李客師之女爲妻（見隰

川縣令李公墓誌銘》。楊炯在梓州官僚贊之自贊中稱「吾少也賤」，而宋之問祭楊盈川文卻說「子之妙年，香名早傳」。其實，「吾少也賤」只是用孔子之典而已，楊炯家雖不是貴族，卻是名門，其伯父楊德裔娶宗室女（見伯母東平郡夫人李氏墓誌銘），而他又與新貴族聯姻，不可謂「賤」。不過，楊炯的仕途並不暢達，他在弘文館待制，「待」就是十六年，直到上元三年（六七六）考中制科，方才補爲弘文館校書郎。

楊炯自幼通經，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。他在咸亨中所作新都縣學先聖廟堂碑、長江縣先聖孔子廟堂碑兩文中，表明他對孔子和儒家思想體系有着全面、深刻的認識。如在新都縣學碑中，他歷述孔子言行事迹，從「至精」、「至神」、「至剛」、「至柔」、「至文」、「至明」、「至恭」、「至和」八方面加以評論，可謂推崇備至。在所作的諸多神道碑、墓誌銘中，對爲國立功、以死報國的武將們進行了熱情的頌揚，又特別表彰儒將，如曰「踐仁義於區域，白璧已輕；許然諾於樞機，黃金豈重。因心孝友，宜於自然；率志冲情，得乎天性」（大周明威將軍梁公神道碑），「唯公被服忠孝，周旋禮樂」（唐右將軍魏哲神道碑），等等。當然，楊炯絕非醇儒，他的思想是以儒家爲主體，融會了讖緯之學，特別對星曆、遁甲等方術熱情很高，又喜言兵，在詩文中隨處流露出來，有着將門之後的思想殘留，而對官方大力倡導的道教、佛教，雖有涉獵，但似乎興趣不大。

楊炯校書郎任滿後，因病在家呆了一年多。高宗永隆二年（六八一），楊炯的仕途似乎出現了燦爛的曙光：是年閏七月，以中書令薛元超薦，被授予崇文館學士，遷太子詹事府司直。崇文館是太子府的

學館，司直爲東宮憲司，雖然二者官都不高（司直正七品上），但卻步入了上流社會，所事者乃皇太子，所與者皆社會名流，機會很多，前程似錦。縱觀楊炯一生，爲崇文館學士大約是他人生中最得意的時期。可惜好景不長。永淳二年（六八三）末，高宗駕崩，太子李顯即位爲皇帝（中宗）。但只做了兩個月，就被其母武則天所廢，立她的另一個兒子李旦爲皇帝（睿宗），然令他居於別殿，不預朝政，武氏自己臨朝稱制，已經是事實上的皇帝。這固然引起皇族及功臣舊族的強烈不滿，紛紛起兵討伐，最有名的，便是開國大將徐勣（曾賜姓李）之孫徐敬業。此事本與楊炯無關，但所謂「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」，不料他的從父弟楊神讓參加了徐敬業起兵，失敗後，與他父親，也就是楊炯叔父楊德幹一齊被殺。此事連累了楊炯，還算幸運，只是被貶官，出爲梓州（治今四川三臺縣）司法參軍，總算渡過了這場令楊家人心驚肉跳的家族危機。高宗時代，楊炯視高宗爲英主，歌頌之不遺餘力，有詩曰：「金泥封日觀，碧水匝明堂。業盛助華德，興包天地皇。」（奉和上元酺宴應詔），而他的恩主薛元超曾因與反對武則天爲后的上官儀書信往來，被流放多年，而高宗死後，他佯稱病瘖，拒絕與武氏合作。楊炯蓋因年輕，從現存文的獻看，他對立后及後來武氏集團奪權所引發的一系列殘酷的政治鬭爭，似乎沒有參與，也沒有表態，但他內心深處的糾結，是可想而知的。尤其是徐敬業起兵和武氏集團對反對派的血腥鎮壓，蓋深深震撼并影響了楊炯的政治立場，所以在赴任梓州司法後，便忙不迭地寫了一首長詩和劉長史答十九兄，以表明自己的態度，與反對派徹底劃清界限。是詩對潤州司馬劉延嗣在城破後不降徐敬業的舉動大加贊揚，曰：「耿介酬天子，危言數賊臣。……受祿寧辭死，揚名不顧身。精誠動天地，忠義感神明。」又謂

「儒夫仰高節，下里繼陽春」。總之，從此之後，楊炯或迫於淫威，成了武氏集團的旗幟鮮明的擁護者，其姿態之高，在當時的文人隊伍中殆不多見，尤其是與同爲「四傑」之一、曾爲徐敬業作討武聖檄（即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）的駱賓王形成鮮明對比。

武則天并不滿足臨朝稱制，而是要改朝换代，做名副其實的女皇帝。載初元年（六八九）九月，她革唐命，改國號爲周，改元天授，加尊號爲神聖皇帝。次年（天授二年，六九一），楊炯梓州司法任滿後回到洛陽，與宋之問分直習藝館，掌教習宮人書畫衆藝。據宋之問祭楊盈川文說，楊炯入習藝館乃「大君（指武則天）有命，徵子文房」，即武皇帝親自挑選的。楊炯對此自然十分感激。如意元年（六九二）秋七月，武則天親御洛城南門，舉辦孟蘭盆法會，楊炯於是上孟蘭盆賦，對武周王朝進行了全面歌頌：「武盡美矣，周命惟新。聖神皇帝於是乎唯寂唯靜，無營無欲。壽命如天，德音如玉。任賢相，惇風俗。遠佞人，措刑獄。省遊宴，披圖錄。捐珠璣，寶菽粟。罷官之無事，恤人之不足。鼓天地之化淳，作皇王之軌躅。」天冊萬歲元年（六九五）秋八月，他又上老人星賦，再次歌頌武則天道：「聖上猶復招列仙，擇群賢。日慎一日，玄之又玄。兵戈不起，至德承天。臣炯作頌，皇家萬年。」約在此後不久，楊炯被選爲新設置不久的盈川縣令，并卒於官，卒年不可確考。一代才子，一顆耀眼的文學明星，於是乎殞落，蓋年不足五十。我們沒有更多的史料，去解讀這位著名作家在文場、官場的心路歷程，但從上面的簡單介紹，仍可大致了解他的身世、思想和在唐初複雜的政治生態中的立場與態度。

二、楊炯的文學思想與詩文創作

自六朝以降，文學不斷新變，既經歷了飛速發展，也累積了諸多弊端。魏徵等在所撰隋書文學傳序中寫道：「江左宮商發越，貴於清綺；河朔詞義貞剛，重乎氣質。氣質則理勝其詞，清綺則文過其意。理深者便於時用，文華者宜於詠歌；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。若能掇彼清音，簡茲累句，各去所短，合其兩長，則文質斌斌，盡善盡美矣。」這裏既指出了六朝時期南北文學之所長所短，也指出了有唐文學發展的方向。但是，文學的革弊創新并不容易，魏徵所期望的融會南北的道路更加漫長。就詩歌論，唐初雖對齊梁詩風有所革正，但就總體言，仍難根本動搖它在詩壇的主導地位，而到宮廷詩人上官儀等第二代作家，又掀起了一股新的逆流，真所謂餘風未殄，新弊復作。這為王勃、楊炯等第三代作家提出了新的挑戰。

楊炯的文學思想，集中表現在所作王勃集序中。該序曰：

嘗以龍朔初載，文場變體，爭構纖微，競爲雕刻。糅之金玉，龍鳳，亂之朱紫青黃。影帶以徇其功，假對以稱其美。骨氣都盡，剛健不聞。思革其弊，用光志業。

「爭構纖微」以下數句，即龍朔「變體」所生新弊，簡言之，一是過於雕琢，二是詞藻華麗，三是太講究用事和聲律對偶。這些，現代學者稱之爲「形式主義」，並認爲楊炯所指，乃是以上上官儀爲代表的「上

「官體」，亦即宮體詩。這是對的。舊唐書上官儀傳：「上官儀，本陝州陝人也。……遊情釋典，尤精三論，兼涉獵經史，善屬文。……舉進士。太宗聞其名，召授弘文館直學士，累遷秘書郎。時太宗雅好屬文，每遣儀視草，又多令繼和，凡有宴集，儀嘗預焉。……（高宗）龍朔二年（六六二）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、西臺侍郎、同東西臺三品，兼弘文館學士如故。本以詞彩自達，工於五言詩，好以綺錯婉媚爲本。儀既貴顯，故當時多有效其體者，時人謂爲『上官體』。」爲應對這場挑戰，王勃發出了詩文革新的號召。關於王勃的文學主張，楊序接着寫道：

八紘馳騁於思緒，萬代出沒於豪端。契將往而必融，防未來而先制。動搖文律，官商有奔命之勞；沃蕩詞源，河海無息肩之地。……壯而不虛，剛而能潤，雕而不碎，按而彌堅。

「八紘」以下數句，是說詩文創作應當境界開闊，融會古今，活用音韻，詞采豐富；而「壯而不虛」四句，則是王勃理想中的文章風格，或者說是他革新詩文的目標。應當說明，楊序雖明裏是對王勃領導的詩文革新理論的梳理和總結，其實不分彼此，暗中也是夫子自道，表明他堅定地站在文學革新的前沿。

弄清了楊炯在初唐詩文革新中的立場和主張，我們就可以較準確地把握并探討他詩文創作的成就和不足。

在現存楊炯作品中，詩歌存量較少，連集外佚詩詠竹、薛洗馬宅宴田逸人在內，只有三十五首，包括五言古詩四首，五言律詩十五首，五言排律十四首，五言絕句二首。可以相信，這在他詩歌實際創作的總量中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。古今各種唐詩選本經常入選的擬樂府詩從軍行，無疑是楊炯的代表作：

若按文選的分類法，是詩可入「游覽」；但從本質論，它又是「詠史」。詩仍然保持着風格雄壯的本色，如用「聳」描寫絕壁，用「射」字描寫長波，極爲生動形象，動人心絃。因西陵峽接近戰國時楚國先王的墓地夷陵（在今湖北宜昌市）和郢都（今湖北江陵），於是詩人的目光不再停留在奇山異水，而是將思緒回溯到遙遠的古代。自「楚都」到「難恃」六句，講的是一段久已湮沒在歷史塵埃中的血淋淋的亡國史，爲了讀懂它，這裏略做些解釋。所謂楚都，即楚之郢都。烜，祭祀隆重貌。高丘，泛指西陵峽一帶山峰。宋玉高唐賦有「巫山之陽，高丘之阻」句，故稱。望祀，望祭山川。「秦兵」二句，史記楚世家：「楚頃襄王二十年（前二七九），秦將白起拔我西陵。二十一年，秦將白起遂拔我郢，燒先王墓夷陵。楚襄王兵散，遂不復戰，東北保於陳城」。其後不久，楚國滅亡。「洞庭」二句，「洞庭」代指三苗氏，「孟門」代指夏。三苗氏有洞庭之險，夏桀有孟門之險，但皆因無德，故終於亡國。讀詩至此，不難發現詩人在舟過西陵峽時，除了對壯麗山河的禮贊外，在現實與歷史中，他想了很多很多。欲國家強盛，在德不在險，對統治者來說，這無疑是血的警示，永遠的箴言。像這種有深度的作品，還可舉出一些，嘗鼎一臠，足以說明楊炯詩歌創作的成就。下字剴切，不拖泥帶水，是構成他雄壯詩風的主要因素。但雄壯不等於粗放，警策的詩句表達出深刻的思想，才堪稱上乘之作。當然，由於所處的時代，詩歌革新的成果有限，就現存楊炯作品看，像上面所舉的優秀詩篇還不够多，有的猶存齊梁遺風，而如和輔先人昊天觀星占之類，則純爲推遁甲、演星占了，很少有詩味。楊炯雖然傑出，仍無法擺脫歷史條件的限制。

在現存楊炯文集中，存量最大的是文章，包括八篇賦，二十二篇碑文（碑記、墓誌及神道碑），十一

篇各體雜文。由於本文不是專門研究楊炯作品的論文，故只作些簡單介紹。

在八篇賦中，青苔賦、幽蘭賦、庭菊賦、浮漚賦四篇，皆詠物抒情小賦。作者善於體物，更善於以小見大，從而提高作品的思想性。比如青苔賦、浮漚賦，青苔乃低等植物，浮漚即水泡沫，可謂是再瑣屑凡俗不過的題材了，但作者通過對它們生存形態的描繪，化俗爲雅，仍從中體悟出若干人生的大道理。如青苔賦曰：「苔之爲物也賤，苔之爲德也深。夫其爲讓也，每違燥而居濕；其爲謙也，常背陽而即陰。重扃秘宇，今不以爲顯；幽山窮水，今不以爲沉。有達人卷舒之意，君子行藏之心。」浮漚賦曰：「迹均顯晦，妙合虛無。同至人之體道，亦隨時而不拘。夫其得坻則止，乘風則逝。處上下而無窮，任推移而不繫。似君子之從容，常卷舒而不滯。故其在陽則隱，在陰則出。泄泄悠悠，匪徐匪疾。固自然以見體，託行潦以凝質。類達人之修身，故不欺於暗室。」物性竟然與人性相通，不僅僅是天人合一，更說明人的美好修爲，是大自然的普遍法則。詠物抒情小賦歷經漢魏六朝的發展，留給後人的空間已不是很多。上舉兩賦，楊炯以物擬人，刻畫細緻入微，在很短的篇幅中，仍能發掘出新的意蘊，消解了卑微與偉大的界限，讀來清新可喜，充分展示出他的創作才能。

楊炯衆多的碑誌雜文，全用駢體寫作，即杜甫戲爲六絕句所謂「王楊盧駱當時體」；後來蓋受到新生代作家的指責，而杜甫則歷史地看待他們，反批評責難者爲「輕薄爲文哂未休」。唐初詩文雖經歷了初步的改造和革新，但似乎在詩歌領域較有進步，而文體變革的步伐卻相對滯後，故齊梁氣味還較濃烈。前引王勃集序所批評的那些文弊，其實在楊炯等「四傑」的駢文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，他們雖都主

張改革，但如前賢所說，「四傑」仍然是「明而未融」。某種寫作模式一旦定型，即便已經認識到它的落後，或弊病已表現得十分明顯，但要改變起來卻不容易。這是因為人的認知能力較強，變化較快，而文章體裁和寫作模式卻相對穩定和牢固，同時又受到習慣勢力的制約，故人們常說「知易行難」。

楊炯（也包括「四傑」中的另三位）駢文的最大弊病，是用典太過繁密，以至陳言充斥，而又喜用故事述時事，讀起來猶如猜謎，有的還近乎啞謎。如楊炯瀘州都督王湛神道碑中有這樣一聯：「恩深母子，比王元之事親；夢感夫妻，等衡卿之至孝。」上聯出自搜神記卷一一：「王哀，字偉元，城陽營陵人也。……母性畏雷，母沒，每雷，輒到墓曰：『哀在此。』」（事又見晉書王哀傳）下聯亦出自搜神記同卷：「衡農，字剽卿，東平人也。少孤，事繼母至孝。常宿於他舍，值雷風，頻夢虎噬其足，農呼妻相出，於庭叩頭三下，屋忽然而壞，壓死者三十餘人，唯農夫妻獲免。」將二人的字各取一字，與姓組合為「王元」、「衡卿」，他們是誰？真讓讀者如墜五里雲霧，作注者則「踏破鐵鞋無覓處」。為文如此，真讓人嘆息。雖然這只是個別極端的例子，但用事、造語奇特卻是普遍的風格，故楊炯的駢文很難讀，這是不爭的事實。至於用詞華而不實，「影帶」（由一事帶出另一事）為文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，尤其是後者較突出，故有的文章雖篇幅不小，內容卻很單薄，如梓州惠義寺重閣銘的浮華和冗闕，即可為例。

不過，若就駢文自身而論，正如杜甫所說，「四傑」的「當時體」有如「江河萬古流」，是永恒的存在。上面所舉楊炯文章之弊，並不表明他駢文水平不高，相反，在「初唐四傑」中，他的駢文成就就不亞於王勃；也可這樣說：楊炯等「四傑」，是最後一批受齊梁遺風影響較深的駢文大家。而如楊炯王勃集序

的脈絡清晰，諸多碑誌、行狀的述事簡潔，用典雖夥，大多妥貼，且格局廓大，景象開闊，若不以駢散論，在今天都可爲法。這無疑是改革使然。楊炯學問淵博，涉獵面極廣，故駢文蘊含了廣博的知識，也表現出他駕御典故的超強能力。他所作神道碑、墓誌銘及行狀，實乃北周至唐初的人物傳記。如所記述蕭彪（北周時改名宇文彪）在齊梁革代、家族殘殺中被迫投奔北魏的史實（後周青州刺史齊貞公宇文公神道碑），王義重（唐恒州刺史建昌公王公神道碑），李楚材（原州百泉縣令李君神道碑），王湛（瀘州都督王湛神道碑），高則（唐上騎都尉高君神道碑）等墓主由隋歸唐時的去就抉擇，無不讓我們了解他們在政權鼎革時期彷徨、矛盾甚至帶有投機意味的真實心態，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。

三、楊炯文集的流傳與整理

楊炯最終死於盈川令任上。他的詩文作品，宋之問在祭楊盈川文中說：「子文子翰，我緘我持。」因楊炯無嗣，雖有一弟，恐不喜此道，故死後文稿由朋友和同僚宋之問保存，而編纂成集，很可能也出於宋氏之手。舊唐書本傳：「文集三十卷。」舊唐書經籍志也著錄「楊炯集三十卷」。這個三十卷本，到宋初已不存，故崇文總目著錄，就只有二十卷。郡齋讀書志袁本卷四上（衢本卷一七）著錄二十卷本時，晁氏解題道：「集本三十卷，今多亡逸。」可見二十卷本是三十卷本之「亡逸」，而非合併。宋史藝文志七除著錄楊炯集二十卷外，又有拾遺四卷。可以想象，歷唐末五代戰亂，至少尚有二十卷保存下來，已

算幸運之至。遺憾的是，二十卷本以及拾遺，至宋以後也散佚了。

明清時代，不少詩歌叢刻本中有楊炯集上下二卷刊行，卷上賦，卷下詩。是本以明佚名輯活字本唐五十家詩集爲早，清江標曾以唐人五十家小集之名刊行。明活字原刊本今分藏於國家圖書館等單位，上海古籍出版社於一九八一年影印。前輩藏書家以爲該本乃宋槧，經專家比較研究，定爲明銅活字本，約刊於弘治或正德年間。學界認爲，此二卷本很可能源於南宋時期的坊刻本（詳見徐鵬唐五十家詩集前言）。其他如明朱警輯唐百家詩、張遜業輯唐十二家詩、許自昌輯前唐十二家詩等，也收有二卷本。亦有僅收詩一卷者，此略。

明萬曆間，龍游人童佩首先搜採楊炯遺文，勒爲盈川集十卷，并輯附錄一卷。傳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一二嘗著錄另一種十卷本楊盈川集，爲「明武勝沈巖校刻本」。此本今唯日本靜嘉堂文庫皮藏一部，據今人嚴紹盪日藏漢籍善本書錄載，該本原爲陸心源十萬卷樓藏書，乃重刻童佩本，未見。清乾隆四十六年（一七八一），項家達輯刻初唐四傑集，其中楊盈川集十卷，即以童佩本爲主，參考張遜業本、許自昌本、張燮本（此本見下）以及文苑英華等相互點勘而成編，并在卷九補入彭城公夫人余朱氏、東平郡夫人李氏兩篇墓誌銘。清同治末，鄒氏叢雅居營重刊項氏本。童佩本又錄入四庫全書（文字略有校改，見四庫全書考證卷七），民國時影印入四部叢刊初編。在明人所輯楊炯詩文全集本中，以童佩本影響最大。

明崇禎十三年（一六四〇），張燮等輯刊初唐四子集，其中有楊盈川集十三卷、附錄一卷。較之童

佩本，除補入朱氏、李氏兩墓誌銘外，篇什別無增益，但分卷不同。

清末佚名輯初唐四傑文集二十一卷，其中楊炯文集七卷，光緒五年（一八七九）由淮南書局刊行，民國時收入四部備要集部唐別集。此本只收文（包括賦），所收篇目及編次全同全唐文，雖輯刊者未予說明，而其底本可想而知。

關於本箋注本的體例，有以下幾點需要說明。

（一）底本。箋注用四部叢刊初編影印童佩本為底本。

（二）校本。所用校本有：張燮初唐四子集本楊盈川集（簡稱四子集）、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銅活字本唐五十家詩集（簡稱五十家）、張遜業輯唐十二家詩本（簡稱十二家）。就總體論，這些本子校勘價值均不大。當日明人搜採楊炯遺文，主要出自宋初人所編文苑英華，故該書實為箋注時的主要校本（用中華書局影印本，簡稱英華），尤其該書原有校語（當是宋人所為），羅列了當時所見「集本」、「一本」等的異文，參考價值很高。其他如唐文粹、宋人類書、明人總集、全唐詩、全唐文，以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等，皆酌以參校。

（三）校勘。凡對校、理校文字訛脫衍倒，皆為改正；兩可者擇善而從，或不作判斷。正文中的唐人諱字（亦偶有宋諱），若有礙文意則徑改（如避「虎」為「武」、避「世」為「代」之類），可通則不改。引文諱字一律不改。因底本文字錯誤甚多，而校本亦不能完全解決問題，故不少文句需弄清所用典故方可辨別正誤，校、注難以分開，故本書校注合一。